

三苏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新时代政绩观的内在逻辑

何梦杨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中国·四川 成都 611433

摘要: 三苏文化蕴含深厚民本思想, 新时代政绩观以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为根基, 二者在价值立场、实践路径、格局境界三方面内在贯通。但三苏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服务于封建统治秩序, 而新时代政绩观强调为民办事、为民造福。厘清二者通约与差异, 对深化理论认知、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新时代政绩观; 三苏文化; 文化自信

The Intrinsic Logic between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in the Three Su Culture and the View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New Era

He Mengyang

Chengdu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 China Sichuan Chengdu 611433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the Three Su contains a profound people-oriented thought, while the view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new era is grounded in the Marxist view of the people as the creators of history. The two are intrinsically connected in three aspects: value stance, practical path, and vision and realm. However,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in the Three Su culture served the feudal ruling order, whereas the new era view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emphasizes working for the people and bringing benefits to the people. Clarifying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eepening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Keywords: View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new era; Three Su culture; Cultural confidence

0 引言

2022 年 6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眉山三苏祠视察时指出: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 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1], 并叮嘱要 “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2]。2026 年 3 月, 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将眉山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三苏文化作为 “千载诗书城” 的核心价值获得了国家级背书。同年, 党中央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要求落实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总要求^[3]。2022 年 3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4]。三苏文化与新时代政绩观在 “以民为本” 这一核心价值上交汇, 深入辨析其内在逻辑, 对于深化理论认知、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1 三苏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内涵

三苏文化承载着厚重的民本思想传统, 其形成既根植于儒家经典的思想沃土, 又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时代语境密切相关。唐宋时期, 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和科举制度

的成熟, 士大夫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显著增强, “以天下为己任” 成为士人的普遍价值追求。三苏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 将传统民本思想推向了新的理论高度。

苏轼在《策别训兵旅二》中提出 “民者, 天下之本; 而财者, 民之所以生也”, 将人民上升到关系国家根本的高度。这一论断不仅继承了《尚书》 “民为邦本” 的思想传统, 更在理论上实现了两个重要突破: 其一, 苏轼将 “民” 置于 “天下” 而非仅仅 “国” 的范畴加以论述。 “天下” 在中国古代政治话语中具有超越王朝政权的道义意涵, 苏轼以 “天下之本” 界定 “民” 的地位, 实质上赋予民本以超越具体政权更迭的终极政治正当性, 使之不再仅仅是服务于一姓之天下的统治策略, 而成为一种具有道义独立性的政治原则。其二, 苏轼将 “财者, 民之所以生也” 纳入民本的立论基础, 从物质生产与民生保障的角度夯实了民本思想的经济根基, 使民本理念从抽象的道德号召转化为具体的民生关切, 从而避免了传统民本思想空谈 “重民” 而忽视民众实际生存境遇的流弊。他以仁爱之心主张 “任天下之患, 同天下之忧”, 以务实之风坚守 “去民之患, 如除腹心之疾”。苏洵在《田制》中呼吁抑制土地兼并, 减轻

百姓负担,将民本理念落实为具体的制度主张。苏辙认为“王道之至于民也,其亦深矣”,强调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顺应民心。三苏“以民为本”的思想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理论层面的历史深化。

苏轼更以贯穿一生的政治实践践行了这一理念。他一生的从政历程遍及徐州、杭州、登州、密州、凤翔、惠州等近十个州郡,所到之处皆以百姓福祉为施政首务。在徐州,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黄河决口于澶州,洪水直逼徐州城下。苏轼刚刚到任三个月,面临的是“水及城下,城中惶恐”的危急局面。他首先“公衣履,杖策,立城上”,公开宣示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以安定民心,随后组织五千民夫筑堤护城。尤为重要的是,在宋代地方官无权调动军队的制度约束下,苏轼冒雨前往武卫营,以“虽禁军,宜为我尽力”的陈词打动守将,成功调动禁军参与抗洪。经过四十五昼夜的奋战,徐州城得以保全。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苏轼“入境问民”之后迅速将调研转化为行动的策略风格,以及敢于打破常规、勇于担当的实干精神。在杭州,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知州期间,发现西湖因葑草藻荇淤塞过半,如不疏浚将严重影响周边农田灌溉和城市供水。他上书朝廷,力陈“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并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代赈的方案,利用朝廷拨付的救灾款招募民工二十余万,历时数月完成疏浚工程。更值得关注的是,苏轼将清淤挖出的淤泥水草筑成横贯西湖的长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既便利南北交通,又打造了垂范千古的人文景观。在登州,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苏轼到任仅五日即被召还京。他并未因任期短暂而敷衍塞责,而是“入境问民,首见父老”,深入民间实地访查,发现当地榷盐制度“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的弊端,随即上书《乞罢登莱榷盐状》,推动废除这一不当制度。清代《登州府志》载,苏轼此议使当地百姓受益近八百年。在密州,苏轼组织捕蝗、抗旱、上书申请减免赋税;在凤翔,他革除“衙前之役”积弊,推行更利民的管理方式;在惠州,他倡建引水工程解决百姓饮水困难。苏轼的从政实践表明,其为政之道始终以百姓利益为唯一尺度,形成了民本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转化。

2 “为民出政绩”是古今政绩观的根本价值坐标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旨向。不管处于什么时期、面对何种局面,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绩尺度都

不可能背离人民群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认识从学理上明确了政绩创造须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准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4],“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6]。这即与三苏文化的民本精神高度契合,又在理论层面实现了质的飞跃。

从价值层面分析,苏轼提出的“民者,天下之本”的论断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4]的论述,都指明了人民群众才是政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苏轼登州五日虽然短暂,但因切实解决了百姓吃盐困难而赢得民心;印证了“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7]这一价值旨向的历史渊源。在方法论层面,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强调“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强调政策主张和改革方案必须建立在“入境问民”的实地调研之上,这与新时代“自觉按规律办事,不在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8]的要求深度契合,彰显了问题导向、实事求是的内在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入境问民”的调研方式并非流于形式。他在杭州疏浚西湖前,广泛走访渔民、农人、商贾,全面掌握了西湖淤塞对各方生计的影响程度,从而在奏疏中能够以翔实的数据和具体的事例说服朝廷批准疏浚方案。他在登州五日间,“到海边访盐民,蹲百姓灶台,尝老妇菜羹”,以最贴近底层的方式获取第一手信息。这种调研的深度和真诚度,使其决策建立在坚实的民意基础之上,避免了“闭门造车”式的决策失误。这与新时代“自觉按规律办事”的要求在精神实质上高度一致——规律不在书本中,而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

然而,三苏的民本思想与新时代政绩观在理论根基上存在本质区别。三苏的民本思想植根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儒家政治伦理,虽将人民置于关系国家根本的高度,但其最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秩序,人民沦为执政者创造政绩的工具和手段。新时代政绩观则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基础之上,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政绩的目的,而非统治的手段。“为民造福”不是执政者的道德自觉,而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历史必然。三苏文化与新时代政绩观在“为民”的价值追求上实现了思想通约,但因理论根基的差异而处在不同的历史坐标,正确认识二者的通约与差异,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前提。

3 “实干出政绩”是古今政绩观的实践纽带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树立正确政绩观，不仅要夯实理论基础，还要落脚具体实践。在实践层面，苏轼政绩实践的实干品格与新时代“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要求高度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10]“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11]。

三苏实干品格的精髓，在于“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与“实事求是”的统一。“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出自苏轼嘉祐八年（1063年）所作《思治论》，该文系统阐述了他的改革方法论。北宋中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士大夫阶层普遍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对于如何改革存在根本分歧。王安石主张“雷霆万钧”式的激进变革，而苏轼则在《思治论》中提出了不同的路径——“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规摹”即治理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原则，苏轼认为改革必须先确立正确的方向和方法论，而非凭一时意气贸然行事。这一方法论的核心，正是实事求是精神在北宋改革语境中的具体表达。苏轼在徐州抗洪中“庐于城上”坐镇指挥，与军民共同筑堤 45 天；在杭州疏浚西湖时，深入实地调查论证，“入境问民”后再作决策。这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的古典形态，即以实地调研为前提，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百姓民生为衡量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自觉按规律办事，要求谋定而后动，防止盲目蛮干，“不要为了出政绩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11]。苏轼实干方式的与新时代“把实事实干”的政绩方法论在本质上一脉相承，区别只是在于时代语境和制度背景的差异。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出自苏轼嘉祐八年（1063年）所作《思治论》，该文系统阐述了他的改革方法论。北宋中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士大夫阶层普遍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对于如何改革存在根本分歧。王安石主张“雷霆万钧”式的激进变革，而苏轼则在《思治论》中提出了不同的路径——“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规摹”即治理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原则，苏轼认为改革必须先确立正确的方向和方法论，而非凭一时意气贸然行事。这一方法论的核心，正是实事求是精神在北宋改革语境中的具体表达。

4 “功成不必在我”实现显功与潜功的辩证统一

三苏政绩实践最具启示意义的地方，在于其将“显功”与“潜功”的辩证统一内化为从政自觉，并在历史实践中得到充分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

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11]。这一论述揭示了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辩证维度，也为我们审视三苏政绩实践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角

苏轼的从政生涯深刻体现了显功与潜功的统一。他在徐州抗洪救城，属于直接挽救了数十万生命的“显功”；但他同时加固海防设施、疏通水利系统，则为徐州长期安全奠定了“潜功”。他在杭州疏浚西湖，一方面使西湖重现碧波美景成为直接惠及民生的“显功”，另一方面深远塑造了杭州的城市生态格局与文化景观，功在千秋。最典型的案例是登州任职：五日登州府中，废除榷盐制度纾解民困是“显功”，上奏加固海防体系、设立刀鱼寨使海防持续至明清是“潜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11]。苏轼从不拘泥于任期长短与个人仕途考量，始终着眼于百姓长远福祉，其政绩创造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高度契合，展现出跨越千年的治理智慧。

2026 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在全党部署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当其时。三苏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新时代政绩观在价值立场、实践路径和格局境界三个方面构成了内在逻辑关联。在价值立场上，“民者，天下之本”的民本思想与新时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在实践路径上，“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实干品格与新时代“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要求共振共鸣；在格局境界上，“显功”与“潜功”辩证统一与习近平总书记“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的重要论述高度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11]。三苏文化的深厚积淀，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涵养为民情怀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深入挖掘三苏文化中的理政智慧，必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 张晓松，朱基钗，杜尚泽等.“让人民群众奔着更好的日子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纪实[N]. 人民日报，2022-06-11(001).

[2]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在新的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2-06-10(001).

[3] 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N]. 人民日报, 2026-02-24(001).

[4]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N]. 人民日报, 2022-03-02(001).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411.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55.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6:50-51.

[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6:115.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136.

[10] 习近平. 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J]. 求是, 2023(13):4-16.

[11] 习近平.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J]. 求是, 2026(7): 4-15.

作者简介: 何梦杨(1998-), 女, 汉族, 湖北襄阳人, 硕士研究生,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主要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